

驭物为灵:论中国“剑”的艺术演化

马文友,杜艳华

(泉州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,福建 泉州 362000)

[摘要]探究中国“剑”的艺术演化过程可知,随着中国“剑”从古战场的淡出,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进行了艺术演化与升华,逐渐地变成了身份的象征、人格的比附,变成了一种传情寓意的符号;人们对其寄予了深厚的审美情感,成为抒发情思、寄托理想的桥梁纽带而沿传至今。

[关键词]中国“剑”;艺术;审美;演化

[中图分类号]J01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671-511X(2016)06-0133-05

中国“剑”因为锋利无比、无坚不摧,且具有“举之无不前”的重要指挥作用,曾被誉为“百兵之君”;然而,自西周以来,中国“剑”又被看成是一种“多情的信物”抑或“教化的手段”。探究中国“剑”的艺术演化历程可知,剑从古战场上退出,进入人们生活视野,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情感与诸多期盼,“剑”完成了它实际功用的蜕变,达到了艺术(品)的高度,变成了一种情感寄托的符号与载体。

一、中国剑的艺术演化

早在西周之初,经过武王以“修文教”为目的的调整之后,剑的价值功能就已经发生了转移和分化。“剑在中国人的心目里,在古代士人的文化生活中,占据了远非其它兵器所能望其项背的崇高地位。”^{[1]8}中国武术中“剑”的地位之所以在百兵之上,是因为它具有其他兵器所不具备的象征意义。剑除具有防身、健身作用外,它早已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,升华为一种有意味的符号或形式。欧阳修的《咏剑》赞美了宝剑具有的这种神奇作用:“此剑在人间,百妖夜收形,奸风与按媚,胆破骨亦惊。”

剑超越了形而下的“实体”转化为人们心目中崇敬和膜拜的形上“神物”,俨然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、一种礼仪制度的考量。李君元《天子剑赋》曰:“物之利者称乎剑,人之尊者称乎天。故一人之所执,谅四海之攸先。必当耀武德,静氛烟,举之无上,挥之莫前。”这里说的“剑”乃指“尚方宝剑”,它是君王身份的象征,手持此物,如君王亲临,大大增加了它的礼仪功用,人们对其崇敬有佳(图1)。帝王之剑既成神圣之物,自然成为审美之物,人们不仅对其打造精良、包装华美,而且赋予其超凡的气度、不朽的光彩。如汉高祖刘邦的“斩白蛇剑”,“上有七彩珠、九华玉以为饰,杂厕色琉璃为剑匣,剑在空中,光景犹照于外,与挺剑不殊。开匣拔鞘,辄有风气。”^{[2]126,217}(图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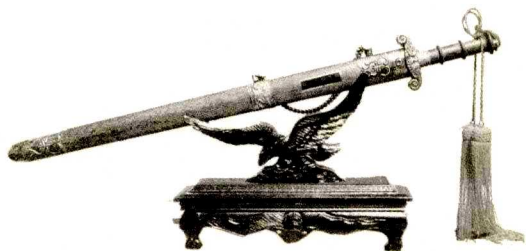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古之尚方宝剑



图2 汉高祖斩白蛇剑

[收稿日期]2016-06-12

[基金项目]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的现代转变及发展模式研究”(12CTY002),泉州师范学院国家级和各部委预研基金项目“视觉文化时代中国武术审美现代性批判与发展模式的构建研究(2016YYSK33)阶段性成果。

[作者简介]马文友(1974-),男,黑龙江齐齐哈尔人,博士,泉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教授,研究方向:武术文化与美学、艺术社会学。

艺术是文化的高级表现形式。剑向更高级的层次发展,必然增加文化含量。从历史角度看,剑的艺术形式在诗、书、画、舞中均有具体的表现^{[3]146}。如李白的诗歌、裴旻的剑舞等等(下文有说明)。这时的剑已经脱离了它的本质属性——技击之物,成了一种道具或一个符号。数千年来人们给剑附加了诸多文化要义,它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及深邃哲理折射出了中华儿女的审美意向。“驭物为灵”——剑被人们赋予更多的艺术气息,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演化,即已从“实用”的“杀人利器”角度去品评转化成为从“审美”的“艺术珍品”角度去欣赏。

二、“剑”形兵实礼的转化

1. 剑乃身份之象征

唐代礼玉创新表现在玉带的使用方面,唐代规定,只有皇帝、王公及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玉带^{[4]146}。正因为如此,玉带皆为精美之物。唐人表示等级差别的玉带,有了更多的装饰意味,具有了更多的崇拜、审美功能。武术器械“剑”亦如此,汉唐以降,它成为了地位和权力的象征,因而有了更多的装饰意味,具有了更多的崇拜、审美功能。《晋书·舆服志》云:“汉制,自天子至百官,无不佩剑,其后惟朝带剑,晋世始代之以木,贵者犹用玉首,贱者亦用蚌、金银、玳瑁伪饰。”《宋书·礼志》亦云:“剑者,君子武备,然自人君至士人又带剑也。自晋以来始以木剑代刀、剑^{[5]52}。”佩剑用木剑,已完全没有了技击的本义,纯属于礼仪而已。

“剑”成为一种仪仗,成为标志文武百官身份地位的象征。“真剑”完全可以被木质和玉质的“假剑”取而代之,说明佩剑已经变成一种习俗。实用价值向非实用价值转化,物质功利性转向了精神功利性,在此语境下,剑被赋予了极强的审美色彩。

2. 兵器变成法器

历史上,剑被誉为“神兵”、“神器”由来已久。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,剑或剑术更被其运用作为法器或神术。佛教教义中的“剑”,也取其寓意,是抽象的精神之剑,而非有形的物质之剑。剑在教义中,象征着神力和智慧。唐朝的永嘉玄觉禅师在《证道歌》中说:“大丈夫,秉慧剑,般若锋兮金刚焰,非但空摧外道心,早曾略却天魔胆。”^{[6]50}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,变成了中国式的宗教。在中国,剑早已成为身份的象征(君子人格)。所以,在佛教中能持剑者亦奉为尊者。在佛教诸神中,金刚力士、夜叉神等担负着护法的使命,都配以武器。根据早期的佛典记载,金刚力士手中并未持剑,而夜叉神是一手持剑、一手持弓矢^{[7]45}。可是,在中国文化的熏染下,佛教中的金刚力士手中出现了剑,而夜叉神手中的剑却不见了(图3)。中国人习惯将崇高的形象更加完美,而将凶恶的形象更加丑化。所以才将自己认为美好而珍贵的宝剑赋予了金刚力士,而“剥夺”了形象凶恶的夜叉神持剑的权利。



图3 手持宝剑的金刚力士



图4 屈原仗剑行吟图

在宗教因素的影响下,中国剑文化被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和色彩。佛家是讲究慈悲为怀、普度众生、与世无争的,然而佛堂与“刀剑”多交织在一起,一种出世的宗教,是不可能以舞刀弄剑的世俗形式来显示其佛法无边的。这里的“刀剑”多指其寓意,一是护法器具,二是象征着佛家智慧。兹举一例。《古宿尊语录》卷三:问:“文殊执剑于瞿昙前者如何?”……云:“何者是剑?”师云:“解心是剑。”至此,“剑”这种兵器在佛堂这里由剑器物象而演变为象征符号,由实而虚、由具体变为抽象,由实用变为非实用,由功利性转化为超功利性,上升到了精神享受的境界,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审美文化。道教之剑,亦有功能转化,也是取其象征之意,变成一种驱鬼辟邪、祈神求灵的法器。这里不再赘述。

三、剑成为一种传情寓意的符号

符号操作活动是人类把握内外世界的特殊方式——观念性方式,符号活动因而也就是一种精神性观念文化活动。符号与纯观念形态的观念意识相比,它是物质性材料;与物质劳动对现实对象的全面操作相比,它又是一种对世界的象征、观念性把握,这便是符号的独特之处^{[8]185}。中国“剑”是一种物质有形体,但它更多时候又是出现在人们的观念性世界中,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罢了。

剑在众兵器中,最富有抒情色彩。“醉中挥剑展魂”,“梦里挑灯观剑”,是古人常常表达的感情。运智慧剑,破迷唤觉,更是自古智者常常运用的方法,这里剑已经成为一种修身养心的代号^{[9]161}。在漫长的中国武术历史长河中,剑作为战场上杀敌武器的时间并不长,汉末时在军中即为环首刀所替代。但其作为一种武术文化的精神象征,作为一种华夏子民的舞具甚至神器,却是源远流长的。剑蕴涵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容,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审美价值,超过了任何一种兵器或者舞具。例如,公孙大娘剑器舞中的“剑器”,将军裴旻手中的“剑”都成为了武者手中的一种“道具”,就像艺人手中的“琴”、舞者手中的“绳或带”,它乃是传递主体情感的信息之物。

1. 剑的拟人化与人格化

唐代著名文学家白居易提出“剑不是用来解决个人私怨的,而是用来惩恶扬善,除奸报国的,只有君子才有资格用剑。”^{[10]65}武林谚语亦有“剑乃君子所佩”之一说,这些都是将剑作为一种人格的文化符号进行比附。

用剑比喻人格的历史记述很多,如诗人屈原的“带长铗之陆离兮,冠切云之崔嵬……”(图4)借“长铗”以寓意诗人的高风亮节,出污泥而不染。剑锋利而又优雅,清高而又脱俗,在中国古代已然是仁人志士修身养性、陶冶情操的伴随和楷模。所谓“琴心剑胆”,“剑,检也,所以防检非常也”^{[2]126}。韩愈的“利剑光耿耿,佩之使我无邪心。我心如冰剑如雪,不能刺谗夫,使我心腐剑锋折”(《利剑》)以及洪秀全的“手持三尺定山河,四海为家共饮和。亲尽妖邪归地网,收残奸宄落天罗”(《剑诗》)等等,正道出了“剑”所具有的这种“召唤民族之魂,闪耀民族正气”之喻意。

比喻、象征是艺术的特征。人们已经习惯将剑比作具有灵性和君子品格之物。如明代剑客毕坤在《浑元剑经》中云:“夫剑乃儒雅中之利器,有正直之风,……具温柔之气,灵则通神,玄能入妙。……诛人间之恶党,斩地小之鬼精。”^{[11]174}将剑奉为奇珍,具有灵性和君子的品格,自古即是如此。它的用途已不仅仅是一种击杀的“武器”或者把玩者手中的一种“道具”,而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旨趣的神圣之物。人们把剑看作通神之物,上可达天、下可入地,有正直之风、儒雅之气,能明辨是非、铲除奸党,俨然变成了忠臣明君的艺术化身。

2. 剑成为一种情感寄托

人只有把自己的情感和想象投射到一定的物象上,才能为感情和想象找到寄托和载体^{[12]23}。中国剑就是这样的一种媒介和载体,剑是历代文人喜欢使用的抒情之物,它成了寄托情感的绝佳题材。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熔炉里,已不再是单纯的兵器,它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,被赋予了浓厚的审美意象。更多时候它不是作为一种实体显现在人们的视野里,而是作为一种抽象比附,一种文化符号反衬在人们的心境中。它是阴柔的代表,多情的信物。它是实现济世救国、超凡脱俗的梦幻与依托。它成就了文学、小说、戏剧还有诗歌,它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象无处不在!它甚至成为了一

种灵魂、一种写照,是洒脱,是正义,是孤傲抑或是离情。

在诗人眼里,剑成了理想与信念的寄托,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价值。李白诗歌云:“少年解长剑,投赠即分离”(《赠易秀才》)。即是直接以剑譬喻友谊,表达了作者的离别之情。“抚剑夜吟啸,雄心日千里,誓欲斩鲸鲵,澄清洛阳水”(李白《赠张相镐》二);“紫燕枥上嘶,青萍匣中鸣;投躯寄天下,长啸寻豪英”(李白《鄞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》)等等,又都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作者立功异域、名垂千古的愿望和抱负。

以剑为载体,借剑抒情的例子举不胜举。如:“三杯拂剑舞秋月,忽然高咏涕泗涟”(《玉壶吟》);“倚剑歌所思,曲终涕泗澜”(《古诗》三十九);“弹剑徒激昂,出门悲路穷”(《赠从兄襄阳少府皓》)等等,诗中的“剑”与“舞”、“秋月”、“歌”、“曲”一样都是创造审美意境的载体,剑与它们一起构成了表达情感的艺术细胞。这些诗句都是借用“剑”的抽象寓意来表达作者或怀才不遇、壮志未酬的惆怅或面对山河破碎而无力回天的哀伤。

此外,还有李益的“边马枥上惊,雄剑匣中鸣”(《夜发军中》)。陈子昂的“感时思报国,拔剑起蒿莱”(《感遇》)。陆游的“逆胡未灭心未平,孤剑床头铿有声”(《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》)等等,这些都是在托物言志,用剑的意象表达报国心声和英雄气概,赋予剑前所未有的豪壮霸气。诗人奋发昂扬、慷慨激愤,通过剑的意象塑造出震撼人心、鼓舞斗志的无穷力量。这就是审美的价值。诗人眼中“剑”的实际功用已经很模糊了,用“剑”实则代表抽象意义的“武”,习文备武君子之业也!只不过是希望通过“剑”表达一种爱国报国、建功立业的美好愿望。

总之,剑乃是中国社会、文化、思想凝结的历史产物,是中华儿女宣泄情感的一种有意味的表现形式。它有着中华大地泥土的芬芳,有着中华民族的情感与气质,也带有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伦理色彩^{[13]92}。剑象征着君子、君子人格。宝剑,也只有有德者才能配之。文学作品中也是极力宣扬这样的价值观。《七剑下天山》、《七剑十三侠》等小说中的“剑侠”多被塑造成仗剑行义、替天行道的形象。一言以蔽之,带有伦理色彩的“剑”,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、价值取向和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心理。

3. 剑超越物质功利性而求精神功利性

剑一旦超越了物质形体、超越了物质功利性,便有了精神功利性的诉求。人们会对其赋予浓厚的审美信息和精神寄托。《庄子·说剑篇》中的“天子之剑”、“诸侯之剑”已将此艺术演化显露无疑。

“天子之剑,直之无前,举之无上,案之无下,运之无旁,上决浮云,下绝地纪。此剑一用,匡诸侯,天下服矣。此天子之剑也。”从上述描述中可知,“天子之剑”是抽象的剑,虽有实物但取其寓意。它摒弃了争锋斗利的形而下境界,成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象征。

“诸侯之剑,直之亦无前,举之亦无上,案之亦无下,运之亦无旁;上法圆天以顺三光,下法方地以顺四时,中和民意以安四乡。此剑一用,如雷霆之震也,四封之内,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。此诸侯之剑也。”^{[7]39}显然,这里所指的“剑”已不是实际击杀之物,它远远超越了实际功用,而成为振兴国家的一种志向、安抚百姓的一种策略,是国家凝聚力的体现,是民族审美意识的聚焦。

四、结 语

“美”在情境中。剑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,在一定的语义环境中,被人们寄予了美好的愿望,获得任何一种兵器所不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,继而被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和美丽的光环。人们喜爱它、崇尚它,已不在于它的实用技击功能,而是一种审美情感。这种情感历久弥坚,越到现代表现得越是明显。如今,剑已作为一种纯艺术品走进了“寻常百姓家”,它那高贵、廉洁、无邪的审美意象成为馈赠亲友的一件礼物或供人欣赏的一件宝器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马明达. 说剑丛稿(增订本)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
- [2] 程大力. 中国武术——历史与文化[M]. 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1995.
- [3] 于志钧. 中国传统武术史[M]. 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6.
- [4] 孔智光. 中国审美文化研究[M]. 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02.
- [5] 《中国武术百科全书》编撰委员会. 中国武术百科全书[M]. 北京: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98.
- [6] 普济. 五灯会元[M]. 张恩富,钱发平,吴德新 编译. 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8.
- [7] 陈宝强. 中国剑文化研究[D]. 上海体育学院,2006.
- [8] 薛富兴. 文化转型与当代审美[M]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.
- [9] 刘俊骧. 东方人体文化[M].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1996.
- [10] 孙东艺. 功夫[M]. 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7.
- [11] 马力. 中国古典武艺秘籍录(上卷)[M]. 北京:人民体育出版社,2006.
- [12] 梁一儒,户晓辉,宫承波. 中国人审美心理研究[M]. 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2002.
- [13] 罗立群. 谈剑录[M]. 上海:百家出版社,2001.

(责任编辑 卢 虎)

2016年荣誉教育国际研讨会在东南大学召开

本刊讯 10月28日,2016年“荣誉教育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卓越大学联盟荣誉学院院长联席会”在东南大学顺利召开。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家茂、卓越大学联盟荣誉学院联席会秘书长杨永出席会议并致辞。来自全美高校荣誉教育理事会(NCHC)、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、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、美国阿肯色大学、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、哈尔滨工业大学英才学院、天津大学求是学部、西北工业大学教育实验学院、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等14位荣誉教育专家奉献了精彩报告;设有荣誉教育学院的省内外高校及高教管理数据与咨询机构共22所院校嘉宾参加了会议。

如何能够让荣誉教育在理念创新、课程创新、培养模式改革和管理制度创新中率先发展壮大,如何使其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,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,成为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。会议以报告、交流、座谈等形式,针对荣誉教育发展现状和困境突破,邀请国内外著名高校分享有益经验和启示。东南大学一直把“培养拔尖创新人才”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使命。在坚持“重基础、重实践、重素质”本科教育教学传统的同时,又进一步提出“卓越化、国际化、研究型”本科教育教学的新境界。吴健雄学院作为东南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,多年来也在荣誉教育模式的构建,选拔和培养卓越化、个性化、国际化人才方面做出了不懈探索和努力。

(李 鑫)